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第25辑

Series Studie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王熙主编 Series Editor: Wang Xi

American Navy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

汪熙 秦岭 顾宁 著

013029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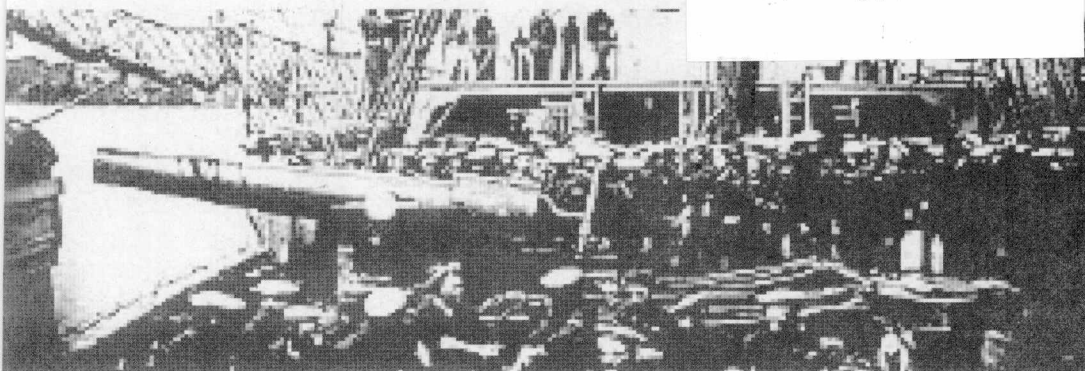
中美

Series 8

汪熙

D829.712

34



American Navy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

汪熙 秦岭 顾宁 著



D829.712
34



北航

C1637557



复旦大学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汪熙,秦岭,顾宁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汪熙主编)
ISBN 978-7-309-09477-0

I. 美… II. ①汪…②秦…③顾… III. ①海军-军事史-研究-美国②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E712.53②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7821 号

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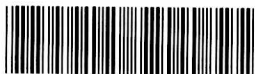
汪熙 秦岭 顾宁 著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3.375 字数 83 千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477-0/E·07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航

C1637557

前 言

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页，翻开日历，正好是 2012 年 2 月 28 日。四十年前的这一天，中美两国签订了《上海公报》。在这四十年中，中美两国除了交换《公报》之外，没有交换过一颗子弹。2011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 4 467 亿美元，比 1972 年的 1 288 万美元贸易额增加了 34 680 多倍，比 1979 年的 245 亿美元贸易额增加了 180 多倍。

历史的脚步声从远处沉重地走来。中国人迷失在历史褶皱里，恍恍惚惚走过了几百年。这几百年来，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王朝震撼、煊赫一时。百年中国饱受凌辱，在世界地图上的蕞尔小国葡萄牙都能强占中国领土澳门几百年，其他列强如英国、俄国、日本则更不必说。此种情形，正如后人描述南宋诗人陆游的心境：“家国恨，山河碎，心潮难平。”但中国毕竟是中国。到今天，美利坚俨然全球霸主，想要一口将世界吞下。但现在世道不同了，没那么容易。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一旦醒来，就是一头猛狮！

近年来，美国在西太平洋用岛链重重包围中国，特别是最近，从澳洲到印度洋的科科斯群岛(Cocos Islands)，美国频频有所动作，意图紧紧钳制中国。中国人是藏锋敛态的，但也是与时俱进的。究竟时局将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本书分工如下：

汪熙，第二章(三)、(四)，第三章；秦岭，第二章(一)；顾宁，第一章，第二章(二)，附录。

汪 熙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早期美国海军对华交往:美国“东印度舰队” 与《中美望厦条约》	1
一、东印度舰队的起源	2
二、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舰队在华行动	6
三、美国对《南京条约》的反应及《望厦条约》的签订	9
第二章 重要的历史事件	15
一、1900 年美海军挫败日军登陆厦门始末	16
二、1927 年南京事件	28
三、“帕奈”号(Panay)事件	44
四、美国海军:《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兼论史迪威将军	59
第三章 南海! 南海! ——西太平洋的争霸	75
附录 美国海军对华关系大事年表(1784—2012)	84

第一章

早期美国海军对华交往：美国 “东印度舰队”与《中美望厦条约》

纵观整个近代的世界,人类之命运、文明之崛起总与海洋息息相关。美国 18 世纪末期建国,它的海军是一支后起之秀。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由于海军力量的薄弱而遭受到了惨重的损失,而后新建的海军更多是出于海上贸易保护的目的。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①为首的联邦派认为:“美国的商船必须得到保护,以防止地中海上的野蛮海盗的劫掠。”^②而美国海军与中国的关系也是从这个原因开始的。

一、东印度舰队的起源

“贸易的冒险追求”^③是美国与中国最初交往的主要原因。从 1785 年美国商人带着满船的茶叶和中国制造的货物回到纽约开始到 1811 年底,378 艘美国商船进入了广东沿海,运输了近亿磅的茶叶^④。可以说,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占了美国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对外贸易的很大比重,使得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很快富足起来。19 世纪初,美国对华贸易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1812 年的拿破仑战争

① 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财经专家,曾担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也是美国政党制度的创建者,在美国金融、财政和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因政党相争而在决斗中丧生。

② [美]詹姆斯·M·莫里斯:《美国海军史》,靳绮雯、蔡晓惠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 页。

③ Foster R. Dulles, *China and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 178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1.

④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Statistics taken from a chart on p. 45.

引发的英美交战打破了欧美之间原有的平衡,英法之间的冲突也波及了美国原有的对华贸易,尽管美国仍然可以越过英国的海上封锁以他们的方式继续保持对华贸易,但贸易额大大下降。在 1805 年英军海上封锁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开始逐步意识到海军建设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的作用,由于 1812 年与英国海军作战之后,美军受到了较大的损失,同时英国还有能力封锁美国的沿海区域,因此美国方面开始萌生了建造舰队的想法;另一方面 1812 年英美战争使得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高涨,麦迪逊总统要求得到高于战前水平的拨款,以用于陆上和海上的防御。美国的民众相信,“一支规模更大的海军不仅能体现国家的重要地位,还能保护美国的商业”^①。

在 1835 年东印度舰队成立以前,有两次美舰来访中国。第一次是 1819 年秋季“国会”号护航舰^②使华,不过当时舰长亨利(John D. Henley)的任务是保护马来群岛附近的商船不受海盗的袭击,而非扩展对华商业贸易。1819 年 11 月 3 日,“国会”号(Congress)抵达内伶仃岛成为第一艘访华的美国军舰。这一行为立刻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他们要求“国会”号立刻离开。亨利告知清政府官员,该舰来东亚的目的是为了应付频繁针对美商的海盗袭击,停留的目的仅为补给,并且需要等待美国领事的命令才能离开。两广总督阮元通过当时的美国行商带话给美国领事韦尔考克斯(Benjamin C. Wilcocks),“‘国会’号(访华)是一个有关美商非常特殊的事件,允许它逗留并进而会产生一些困扰是不明智的”。威尔考克斯回应道:“立即下命令让舰艇马上离开。”^③但是亨利并没有理会清政府的抗议,因为相似的情况

① [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王琛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4 页。

② 这艘护航舰是 1794 年授权建造的 6 艘舰只中的一艘,排水量 1 265 吨,配有 36 门炮并可载有 350 名舰员。引自 Charles C. Chadbourn, III, *Sailors and Diplomats: U. S. Naval Operations in China, 1865-1877*,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6, p. 223。

③ 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6-1883*,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11, Edict of Hea-King Vi Yien, [November 1819], also see in *Sailors and Diplomats: U. S. Naval Operations in China, 1865-1877*, p. 20。

在其他国家的军舰进入中国海域内都会时有发生,而且这些清政府的抗议更多地被认为是形式上的“走过场”,并被习惯性地忽视了。尽管被允许停留在内伶仃岛港口得到补给,但是“国会”号这次最重要的目的——为美商护航却遭到了拒绝。那些美商也不愿意得罪清政府的当地官员。1821年5月29日,“国会”号返回美国。作为美国海军与清政府的第一次交往,美国人看到了在东亚建立一个海军行政机构的必要性,既可以给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海域领航,也能够第一时间保卫美国的商业贸易安全。同时美国也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仍然足够强大可以防止外国势力的干涉和介入。而广州的美国商人也意识到美国海军没有介入中美贸易的必要,“我们不期望‘炮舰’政策,这只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和贸易受扰”^①。

第二次美舰使华情形已经大有不同,这是美国第一次的全球航行。而美国的对华贸易额也从8年前“国会”号访华以来增长至平均每年462.5万5美元^②。而此时广州的美国商人也乐得让英国皇家海军作保护伞,而不需要美国海军的帮助。护航舰“温森斯”号(Vincennes)^③由芬奇海军中校(William S. Finch)担任舰长,于1829年1月抵达中国。而美国驻广州领事及当地美商就商业关系总结了一份报告给芬奇,报告指出“促进和扩展对华贸易的重要性”,同时认为“战舰的来访有利于得到更好的结果”^④。但自从第一次“国会”号使华保护美侨遭到拒绝以后,整整9年中国沿海从未有任何美国军舰游弋,因此美商也希望外交干扰不要对丰厚的商业贸易利润产生

① Foster R. Dulles, *China and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 178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80.

②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pp. 551, 553.

③ “温森斯”号,16门炮护航舰,排水量700吨,可载190名舰员。引自 Charles C. Chadbourn, III, *Sailors and Diplomats: U. S. Naval Operations in China, 1865-1877*,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6, p. 224.

④ Charles C. Chadbourn, III, *Sailors and Diplomats: U. S. Naval Operations in China, 1865-1877*,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6, p. 185.

影响。芬奇抵达澳门后与广州美国领事塔波特(C. N. Talbot)及其他一些广州的美商通信,他询问了对华贸易与美舰定期访问中国海域的明智性。美商回应认为关于美舰在中国海域内的游弋确实加强了美国在广州的地位,但是他们也指出目前中美商业贸易已经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地位了。尽管如此,与其他洋人不同的是,美国人处处受到中方的责难^①。回信对于美商的处境写得非常明确,但是美商仍然表示不希望美舰有任何超过内伶仃岛海域的举动,从而“违背了这个国家的传统”^②。尽管“温森斯”号在中国只逗留了几个星期,但是它的使华却成为美国海军与清政府交往的一个重要转折。而美商给芬奇的那封信或许表明美国海军力量是改进中美关系的要素,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从纯粹的“自由贸易”向“炮舰外交”转变,从1830年开始,美舰频繁来往广东沿海。1835年,美国参照英国皇家海军,组建了它在亚洲的海军力量——东印度舰队。而此时,英国在华贸易却陷入了困境。由英国政府直接任命的律劳卑勋爵(Lord William J. Napier)代替东印度公司管理英国对华贸易以后,加大了鸦片的对华输出,因此与广州清政府当局的矛盾日益加深。清政府以英国“不守旧章,自绝于天朝”^③为由,停止对外贸易。英方只有将律劳卑召回,其后中英贸易虽恢复,但是中英矛盾已不可调和。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东印度舰队直到1836年才第一次访华,美国海军准将肯尼迪(Edmund P. Kennedy)率“孔雀”号(Peacock)及“企业”号(Enterprise)抵达澳门,加强了与清政府的交流。而此时中英战争的阴霾已然不能驱散了。

① American Merchants to Finch [January 1830], quoted in Charles O. Paullin, *American Voyages to the Orient, 1690-1865*, Annapolis, Maryland: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1971, pp. 37-38.

② Charles C. Chadbourn, III, *Sailors and Diplomats: U. S. Naval Operations in China, 1865-1877*,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6, p. 25.

③ 陈志奇:《中国近代外交史》,台北:天南书局1993年版,第145页。

二、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舰队在华行动

鸦片战争以前中英在海面上的小规模冲突就已经不断。而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并未因不断升级的摩擦和冲突受到影响。在早先美国对华贸易的交往中,美国的名声一向不错。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对待与“外夷”通商,一向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凡不遵法度者,“将其驱逐不准通商”^①,并一再晓谕,“许恭顺之各洋行先后进口开舱”^②,因而美国仍然凭借其固有的好名声而继续正常的对华贸易。美国持续关注并不是对中英战争的预期,而是在战争来临前中英贸易打断后如何获得最大的利益。他们很担心一旦英方获胜,目前美国在华原有的贸易优势会荡然无存,因而这种欲战未战的状态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波士顿和塞勒姆的商人向国会提交了议案,要求美国派出舰队去中国的同时也要在与清政府谈判的时候小心谨慎^③,很明显他们想从中英冲突中坐收渔利。

1840年英国政府最终对华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并以《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而告终。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由此改观,先前认为中国尽管闭关自守但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在中国战败以后,则觉得“中国已经堕落而濒于灭亡之境”^④。对于《南京条约》的签署,美国则是有喜有忧。一方面,美方尤其是美商对于清政府原有的通商和税率政策早已有所不满,因此也希望这场战争的发生能够改变其原有在华的贸易地位,美方没放一枪一弹,仅凭《南京条约》中的五口通商协定,便可将原有的贸易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八。

② 夏燮:《中西纪事》卷三。

③ Curtis T. Henson, Jr., *Commissioners and Commodores, The East India Squadron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2. p. 33.

④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1784—1894)》,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页。

范围扩张到整个中国沿海地区；另一方面，美国也不满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做法，认为这种行为有违于美方一贯的自由通商的原则，同时美国能够从 1840 年前夕的中英冲突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南京条约》则将美国原有的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扩张的想法完全打断了。而同时更令美国感到关注的是，英国凭借条约取得在华特权，从而获得了更多开放的港口，而这些港口开放很可能只适用于英国商人。因而，美商向美国政府呼吁保护他们的利益避免受到任何可能发生的这种排斥^①。

1842 年 4 月 11 日，东印度舰队司令加尼（Lawrence Kearny）率“星座”号（Constellation）等两艘战舰来华并到达黄浦江沿岸，他成为第一个抵达中国内河的美国海军军官^②。加尼要求对在广东中英交战过程中美国人受到的攻击和监禁给予补偿^③。最初加尼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美国公民在华利益，但是很快加尼发现，美国人在中英交战中并无太多损失，处境也不如先前预想的那么危险，因而没有进一步介入中英战争。但在《南京条约》签署以后，加尼对英方以“条约获得好处和达成协定”的做法颇为欣赏^④，因此也想为美国通过条约形式获取相应利益。但事实上加尼并未被授权与清政府开启谈判，不过作为美国在远东的最高级别军官，他意识到他有责任继续待在中国直到美国未来在中国的地位明朗化。他告知美国海军部他的决定，并将先前希望再派一名外事官员和加强东印度舰队的规模的建议重新提了一次。在加尼看来，一支强大的美国海军是获得一个对

① Samuel Flagg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Reinhardt Winston Company, 1965, p. 345.

② 《澳门月报》第 11 卷，第 320—325 页；转引自〔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陈郁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13 页。

③ 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6-1883*,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11, Edict of Hea-King Vi Yien [November 1819], also see in *Sailors and Diplomats: U. S. Naval Operations in China, 1865-1877*, p. 195.

④ 〔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张静尔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 页。

美方有利的条约所必不可少的。“除非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信服于我们的力量,否则他们就会被英国人的政策所支配,从而来执行一些有损于美国的利益和贸易的政策。”^①当他得知清政府派专员来广州就《南京条约》的商业增约进行谈判时,觉得是一个就美国的利益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的好机会。1842年10月,东印度舰队驶入广东沿海。“美国商业利益这一重要因素决定了我继续将‘星座’号停留在广东,我希望能得到国务院的支持,我应该留下直到我得到一些东西。”^②加尼首先试探了两广总督祁贡的反应,他提出美国也应该享受同样的在华特权,祁贡立即给予回应,他表示基于先前两国的友好商业往来,《南京条约》生效后美国可以享受相同的优惠待遇。他还做出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承诺:“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商人仅仅获得一根枯树枝是不被允许的(意味着他们的利益也将被照顾)。”^③但事实上,在没有获得清朝皇帝的批准之前,祁贡的承诺没有任何意义。而加尼却乐观地向美国领事斯诺(Snow)表示,美国将很快获得与英国相同的在华特权。斯诺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美国争取在华利益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动用武力。因此他希望东印度舰队能够等到来年二月再离开中国,以便美国的利益不至于被遗忘。

然而加尼希望出现的谈判却迟迟没有发生,于是1842年12月他离开中国前往马尼拉,不过很快在1843年1月回到中国。在他离

① Kearny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23 September 1842, Kearny Correspondence, p. 20. quoted in Curtis T. Henson, Jr., *Commissioners and Commodores, The East India Squadron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2, p. 39.

② Kearny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7 October 1842, EISL, vol. 1, quoted in Curtis T. Henson, Jr., *Commissioners and Commodores, The East India Squadron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2, p. 40.

③ Kearny to Ch'i Kung and Ch'i Kung to Kearny, 8 and 15 October 1842, Kearny Correspondence, pp. 21-22. Quoted in Curtis T. Henson, Jr., *Commissioners and Commodores, The East India Squadron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2, p. 40.

开的这段时间，在广州发生了针对美国工厂的暴乱，造成了美商的财产损失，领事和美商都希望借用东印度舰队的武力对清政府施压，并准备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声明。而加尼认为仅凭声明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不需要靠武力威胁。

加尼在美国在华特权的问题上与祁贡反复沟通谈判，也迟迟没有离开中国。虽然他在中国的努力直到离开前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他却成为美国海军史上的一个特例，一个海军高级将领在没有得到国务院及海军部的授意之下，履行一名外交官员的使命，希望通过他与清政府官员得到谈判，来谋求美国在华利益的最大化，而在以后美国海军对华交往中，海军官员则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对华事务的谈判中了。在加尼回国以后，他也一直呼吁美国政府应更加关注中英战争的结果，因为“美国在华贸易额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在整个南美的贸易额”^①。加尼的努力为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

三、美国对《南京条约》的反应及《望厦条约》的签订

在加尼在华期间，中英两国已签订《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得知此情形以后，加尼致函两广总督祁贡，提出今后美国商人来华贸易应享受最惠国待遇（most-favored-nation）的要求。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总统泰勒（John Tyler）立即（1842年12月30日）咨照国会，报告《南京条约》的内容，并谓英国获得新增通商口岸的权利，他国能否一如英国，尚未可知，美国对华贸易额每年已达九百万之巨，若增加通商口岸后，贸易额将必随着扩大，故建议国会允拨经费，遣派四十四岁的顾盛（Caleb

^① 仇华飞：《从对抗到妥协：中美〈望厦条约〉签约过程研究》，《史学月刊》2009年第3期，第68页。

Cushing)为使华委员。顾盛的任命确定以后,国务卿勃士(Daniel Webster)致函波士顿等地的美商,他们联合上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主要还是针对美国应派出有相当实力的舰队来展示国力,增加谈判的砝码。

使团于是派出了军舰“勃兰的湾”号(Brandywine)与“圣路易”号(St. Louis),海军准将巴尔克(Commodore Foxhall A. Parker)麾下的新式蒸汽军舰“密苏里”号(Missouri)则为使团的座舰^①。顾盛于1843年7月31日乘“密苏里”号离美,原计划先至埃及,取道陆路至红海,乘船到孟买与美国东印度舰队汇合,再同驶中国。不料“密苏里”号在直布罗陀海峡失火,原本打算向中国炫耀的新式军舰竟毁于途中。顾盛遂改乘英船绕道好望角而抵孟买,再乘“勃兰的湾”号于1844年2月24日到澳门。

此时耆英已返两江总督任所,祈贡已卸任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程裔采代理两广总督。故自顾盛到澳门之第三日起(2月27日)至同年6月9日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致函顾盛止,三个月有余的时期内,为程裔采与顾盛交换信函的时期。

顾盛认为订约之事尚无把握,4月13日即以武力示威的方式威胁程裔采,遣派“勃兰的湾”号直驶黄埔,巴尔克准将欲鸣礼炮并拜会总督。以后,顾盛即以战争作为威胁程裔采的手段,往来照会,均非“恭顺”之辞,使得程裔采“未感一一钞呈御览,致涉烦渎”了。军舰擅自冲至黄埔,程裔采令其约束禁止,正在缮发间,顾盛充满火药味的照会已送到,宣称在西方友好国家中,如果拒绝接见外交使节,乃是“一种足以构成战争原因的行动”。

在中美望厦村的谈判中,中国方面的中心工作是阻止美使北上,美国方面的主要任务是签订商约。耆英以订约作为美使放弃北上的

①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1784—1894)》,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3页。

交换条件，而顾盛则以北上作为订约之挟持，故其主动权操在顾盛手中。一旦顾盛认为时机已到，便放弃进京陈述国书的要求，议订条约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而事实上，清政府对于美舰的威胁自始至终都并不知情，为防止美国“不可为人所愚”，宜“准一体通商，以示绥抚之意”^①。

按 1840 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 (Lord Palmerston) 致懿律 (George Elliot) 的训令中所述，如中国政府允诺订约给予英侨以通商之安全与自由，即可不要求中国割让沿海之岛屿。要求治外法权之要点为：英人运华货物，为中国法律所禁止者，或为中国法律所许之货，私运中国，未经纳税者，中国官府均可将之捕获没收，但不得因此而罪及英国人民之身体。由是观之，英国政府原只盼在割让海岛与缔结载有领事裁判权在内的商约中，二者择一而行。但由于当时伊里布、耆英等人对国家主权观念之知识不足，既割香港，复以领事裁判权予英人。英人如此重视领事裁判权，而《虎门条约》所规定者，不过是英人犯罪，由英领事自行审判与处罚而已。《望厦条约》则不然，除美国人在中国犯法由“由美国领事等官员审讯”外并规定美国人与他人在中国通商口岸所有案件，中国亦不得过问。此外《望厦条约》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以及第二十九条，均属与领事裁判权有关者，较之《虎门条约》所给予中国主权独立所加之伤害，超过多矣。

应该说，美国海军对华交往在鸦片战争前并不是非常频繁，美国在华商人也一直秉持着“自由贸易”的原则，因而并不希望他们的国家通过武力来干涉正常的对华贸易往来，这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清王朝行政能力的畏惧。但是英国皇家舰队在中国沿海的行动，使得美国政府相信只有在亚洲拥有同样一支独立的海军力量，才能保证对华贸易的一视同仁。随着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战略地位的提高，美国

^①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二，页十。

最终建成了在亚洲独立的海军力量——东印度舰队,这也意味着美国从原先的“自由贸易”政策向着“炮舰外交”政策转变了。但事实上,美国的“炮舰外交”却与英国大有不同,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舰队未曾参与到中英战争中来,仍然坚持着以谈判为第一原则。从舰队建立到鸦片战争爆发,不过短短十年不到,东印度舰队已经成为了亚洲地区一直不可低估的力量,在鸦片战争及随后中英《南京条约》谈判的过程中,东印度舰队本来仅仅承担着保护美国在华侨胞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责任,但是作为舰队司令的加尼却敏锐地认识到美国在华特权的重要性。因此独自承担对华谈判的重任。尽管直到加尼回国,美国在华特权都没有以条约的形式保留下来,但为美国获得在华最惠国待遇及《望厦条约》的签署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开了海军高级将领在华行使外交权力的先河。顾盛在中美订约上的谈判,使得美国的在华利益以条约形式保存下来,而在《望厦条约》中除了美国在华“门户开放”的外交原则初露端倪外,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更是进一步剥夺了中国政府的主权。谈判期间,美舰“勃兰的湾”号驶向黄埔,也是美国军舰第一次由通商口岸向内陆沿岸进发。

《南京条约》与《望厦条约》以后,中外关系(包括中外贸易)的格局完全改变了。以前,贸易只限于广州,洋商不能与官府接触。所有的外商只能与官府指定的买办接触。清政府这种“驭夷枢要”的思想百年来也未曾改变。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第五款规定“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所其便”。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第八款规定,雇佣买办等人“应各听其变”,中国地方官“毋庸经理”。这才打破了清政府经营了百余年的“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贸易管理制度^①。对外贸易重点也逐步从广州移到上海。从1849年到1852年,美国对上海的贸易成倍地增加(如表1、表2所示)。

^① 汪熙:《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78页。